

诗人

毛泽东

(二八)

毛泽东诗词·美学漫步

朱海出版社

董正春 著

诗人

泽东诗词

美学漫谈

漫步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毛泽东/公木等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9.9

ISBN 7 - 80607 - 615 - 8

I . 诗... II . ①公... III . 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 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49010 号

诗人毛泽东

作 者:◎公木

终 审:成平

策 划:赵洪林

责任编辑:赵洪林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48 字数 96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ISBN 7 - 80607 - 615 - 8/A · 1

总 定 价:60.00 元(全五册,本册 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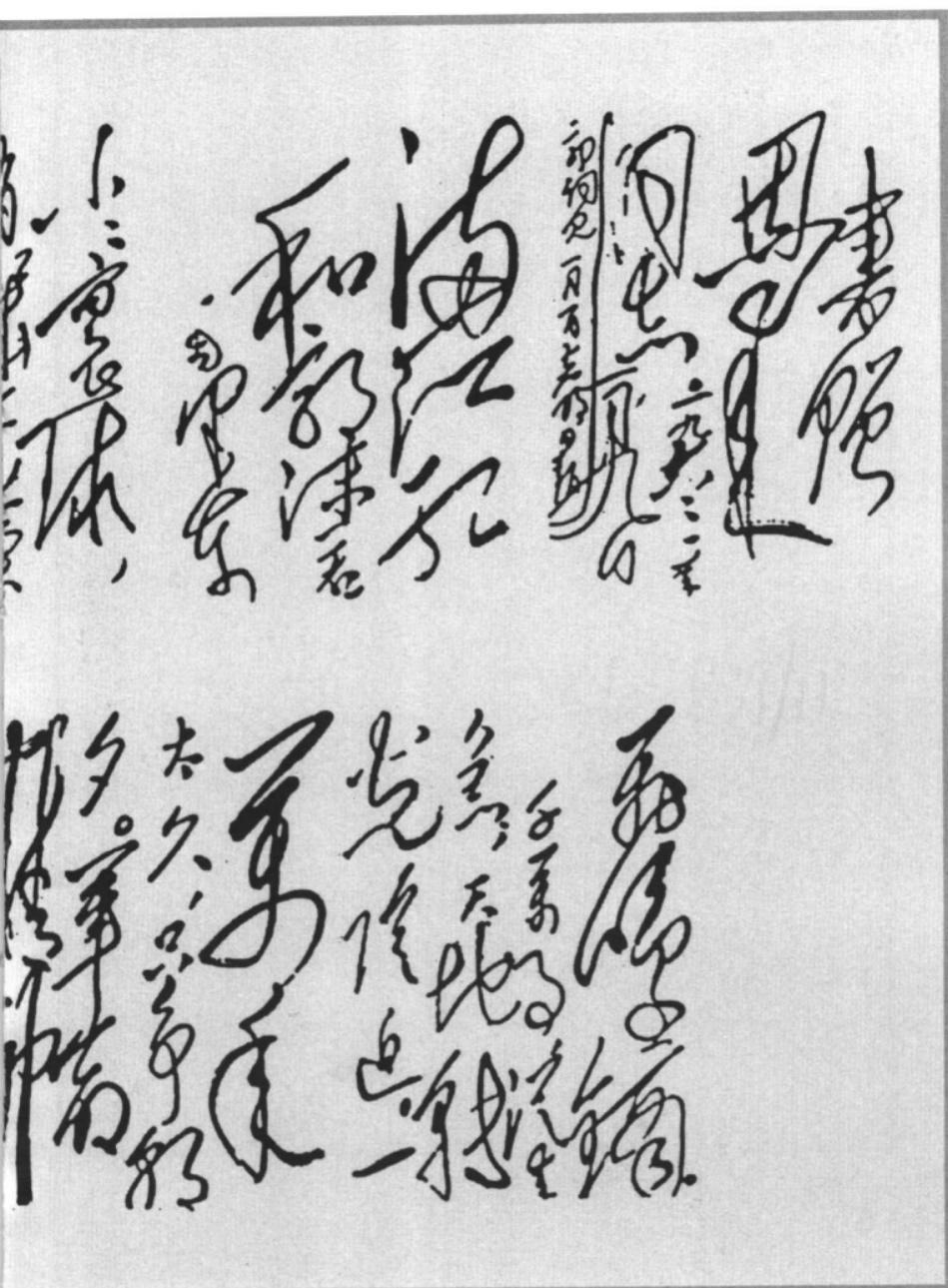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
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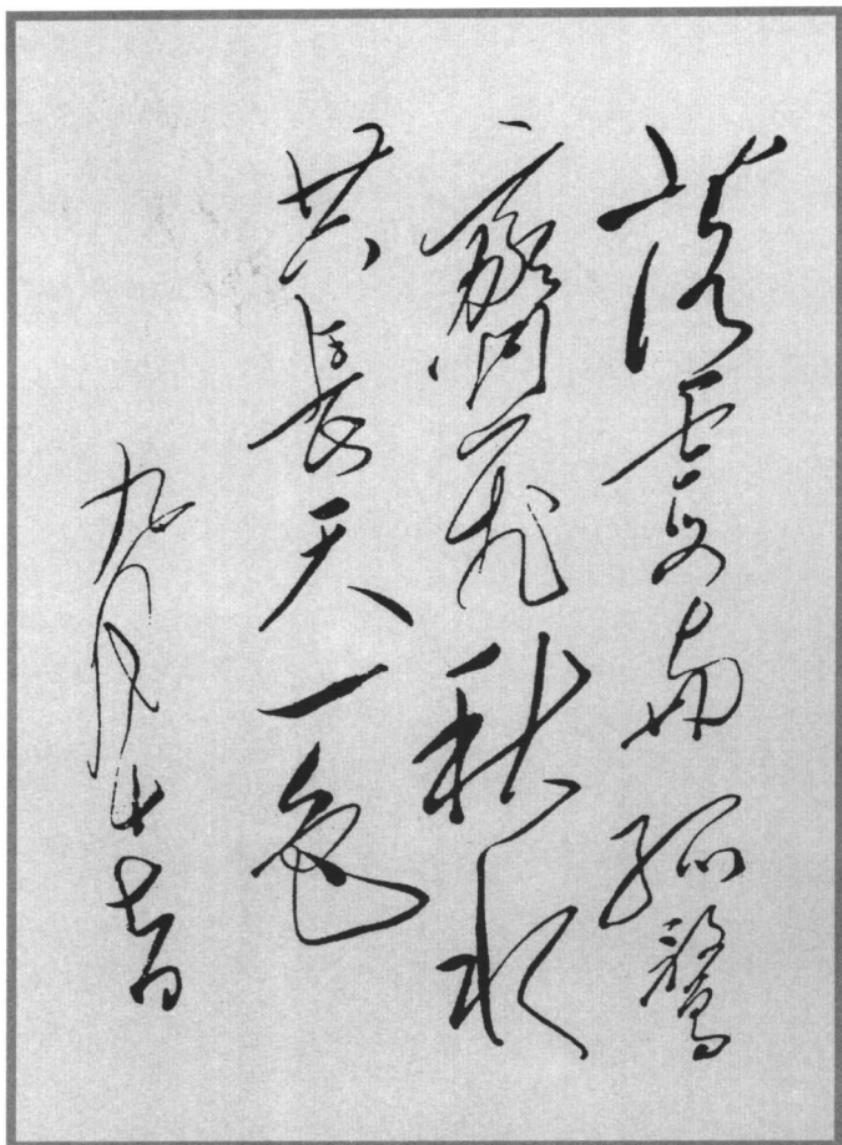
毛泽东30年代的诗词手迹《七律·长征》

傳碑等之
筆意
清都御史屬宋
卿之遺物也。前
有唐柳公權題記云
右軍書。聖朝之寶。人
間之珍。不可謂不精矣。又
有宋徽宗題記云
此乃右軍真跡。其書

書翰一函。右軍之書。世多
有之。此固為上品。余故不復以爲
寶也。右軍之書。世多有之。此固為上品。余故不復以爲
寶也。右軍之書。世多有之。此固為上品。余故不復以爲
寶也。右軍之書。世多有之。此固為上品。余故不復以爲
寶也。右軍之書。世多有之。此固為上品。余故不復以爲
寶也。



毛泽东书赠周恩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手书《赠毛岸青·邵华联》

(毛泽东手书资料由季世昌提供)

目 录

一、毛泽东的美学追求	(1)
二、毛泽东的诗词美学	(10)
1. 诗歌的产生	(15)
2. 诗歌的本质	(17)
3. 新诗的发展方向	(19)
三、毛泽东诗词的“十体”风采		
1. “马背上哼成的”征战诗	(24)
2. “嘤鸣而求其友声”的赠答诗	(66)
3. “乐山”、“乐水”的登临诗	(97)
4. “似花非花”、“不离不即”的 咏物诗	(130)
5. “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的 咏事诗	(154)
6.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悼亡诗	(161)
7. “立象以尽意”的题照诗	(180)

8. “借往古之事，抒自己之怀抱”的咏史诗 (184)
9. “讽兼比兴”的寓言诗 (191)
10. “相知之深，相爱之笃”的爱情诗 (195)

四、毛泽东诗词的“十美”神韵

1. “一篇读罢头飞雪”：壮阔的史诗美 (202)
2. “梅花欢喜漫天雪”：高洁的情操美 (218)
3.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伟岸的形象美 (228)
4. “人间正道是沧桑”：深邃的哲理美 (232)
5.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慷慨的悲壮美 (243)
6.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诙谐的嘲讽美 (249)
7.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隽永的意境美 (254)
8. “风物长宜放眼量”：辩证的和谐美 (260)

9. “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绚丽的 色调美	(268)
10.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 深苔滑”铿锵的声韵美	(274)
五、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和毛泽东 美学思想体系	
1. 呼之欲出的“润之体”	(287)
2. 有待开掘的毛泽东美学理论	(307)
后 记	(315)

一、毛泽东的美学追求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据说是最早由德国的鲍姆加登创立的。他认为人类心理活动的知、意、情三者蕴含的“真”、“善”、“美”分别产生了以其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这位德国哲学家于1935年即倡议创建“美学”，并于1750年出版了他的《美学》专著，就其希腊文“埃斯特惕卡”的原意来说，应是“感觉学”，可见他是从审美感知来理解和表述“美学”的，尽管鲍姆加登因此而被称作是“美学之父”，但“美”及“美学”等等也绝不是从他这里才开始有的，人们对“美”的感知乃至对“美”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青年毛泽东当年就曾有过“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的警句。他在谈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写下了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其中包括了如上所说的对“美”与“美学”方面的一些见解。“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的观点，之所以值得重视，是

因为它涉及到了美的客观的历史的存在，涉及到了美丑观念的形成等一系列重要的“美学”问题，显然青年毛泽东的观点是受到中西古老文化的美学暗示而形成的。统观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的基本观点，就哲学的分野来看还是二元论的，他认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足见他当时认为事情的发生有的源于自然、有的得之于人为，这或许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早年所信奉过的康德心物二元论吧。但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又有着可贵的“天地盖唯有动”（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的观点，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而且，他把这种“动”与“变”的观点运用到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之中去，他不仅将历史看作是一个“动”与“变”中的治乱交替的社会发展过程，而且明确地表示喜欢那些社会巨变的时代，“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都是有好处的，他接着分析说：“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种朴素的辩证的哲学观点而引发的人生观应该说与处于空前剧变中的近代中国的现实要求是合拍的，是进步的。毛泽东在“批

语”中声言：“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并且提出对于当时的中国“必须再造”、“由毁而成，如孩儿从母腹胎生也。”由此可以嗅到“五四”新青年一种浓浓的崇尚变革的时代新气息。

在青年毛泽东这段“批语”中，有两个“概念”特别显眼，那就是“差别”和“抵抗”。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并说：“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在众多的“差别相”中，青年毛泽东举出了包括“美丑”在内的一系列对立物。而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便产生了另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抵抗”。青年毛泽东对“无抵抗则无动力”十分欣赏，认为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并以哲人的深邃诗人的热情进行了一番淋漓的发挥，他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因此，他认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以上关于“差别”、“抵抗”的诸多观点，显然是后来毛泽东矛盾、斗争、转化的哲学观点的一种孕育，说它是毛泽东《矛盾论》的一种“滥觞”似乎也无可吧。在这里，青年毛泽东对社会、对人生的哲理化的一番思考，无疑也是他对美学的一种探

索和追求，是毛泽东美学品格的一种反映。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出现于 18 世纪末叶，在中国则是出现于 20 世纪初。而毛泽东在中国美学的草创时期应该说是首批觉醒者之一。1917 年前后，毛泽东便对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青年毛泽东在 1919 年发表于湖南《大公报》上的文章《非自杀》中曾说过：“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罗学瓒在 1917 年的一则日记中就有一次借阅“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的记录。这里所说的“西洋伦理学七本”指的是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自然要涉及到人们对善恶、美丑以及对美的理想的追求，青年毛泽东对伦理学的浓厚兴趣必然使他旁及到美学的种种问题，从而引发对这方面问题的探求。从毛泽东早期的著作和笔记中，已经不时地看到他所使用的诸如美学、审美以及美感、美育之类的词语。在他喜欢阅读的许多哲学、伦理学著作中，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尼采、叔本华等人的美学观点自然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影响并引起他的兴趣和思考。当时毛泽东虽然没有关于美学的专论和专著，有的只是一些有关美学方面的片断言语，但从中已经看出他已经有了并不肤浅的见解。还是以那篇《批

语》为例，内中就有“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著之于诗，始美且雅。”这里也不妨说也已接到了文艺学中作家的“情”与作品的“美”之间的关系了。因此他认为“种种著述皆不过勾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这些也不能不说是对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的一种探求吧。难怪他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把“美学”也列为要输入的“世界新思潮”之一，并要“共同研究、择要传播”呢。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点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古典传统美学，其古老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青年毛泽东在 1913 年记录杨昌济、袁仲谦老师讲授的修身课和国文课的《讲堂录》中就涉及到中国古代至近代的许多历史人物，像孔丘、左丘明、孟轲、孙武、司马迁、班固、曹操、诸葛亮、孙权、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朱熹、程颢、王夫之、魏源、梁启超等数十位，而且都有其代表著作和成就的介绍。青年毛泽东学习之勤、钻研之深、所受影响之大于此可以推知。在《讲堂录》的一开始便是毛泽东亲手抄录的我国古代第一位爱国主义、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和《九歌》，他对屈原这些作品的喜爱可以说是终其一生，1959 年，他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

及屈原的有关著作五十余种拿来阅读，1958年在给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据说以后又多次重读。1961年，毛泽东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了宋版《楚辞集注》，1972年，中日建交时，毛泽东赠送给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礼品就是一套线装的《楚辞集注》。另外，《讲堂录》中还有自学韩愈文章的“札记”，关于学韩文的事，毛泽东后来专门在陕北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过：“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散文。”（《西行漫记》）这里所说的“袁大胡子”，即在师范读书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国文、习字教员袁仲谦。以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中他所受到的包括中国传统美学在内的熏陶以及包括美学观点在内的各种观点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在《讲堂录》中就有记载，他说：“文以理胜，诗以情胜”，已经触及到了文与理、诗与情的关系的美学上的重要问题，

特别是诗或文艺作品以感情表现为主的提法，更是颇具见地。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艺学的概括，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种继承。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的这种美学观点是直接受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学而形成的。我国古典美学中有一种关于情志说的理论传统，古人认为情志是文艺作品的灵魂，它既是对文艺作品的情感性的要求，也是对作品思想性的要求。情志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诗或其他文艺作品要表达人们的感情、意志和抱负。这一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偏重于抒情方面的特点，强调要在作品中表达作者的志向，抒发作者的感情。”（王岳《毛泽东的美学品格》）这种观点实际就是《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毛泽东曾数次亲自书写，可见对它的重视。毛泽东以此律己、律人，正是他自年轻时就已开始的一种美学追求，一种毕生追求的美学理想。

青年毛泽东在其《讲堂录》中提到了“切”的问题，他说：“无论诗文，切者为美。”切者，合也。他主张诗文只有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合”，才能算是“美”，由此可见，美必须以“真”为基础、为前提。仔细推究起来，“切”的含义应是多方面的，它还涉及到诗文的内容、形式相合以及文艺美的创造主体的识、学、才的问题。